

政治理论何以影响政治实践

——以麦迪逊政治理论为中心的分析

张国栋,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 麦迪逊政治理论对政治实践的复杂影响显示,政治实践受到内在因素(追逐利益的冲动、德性和知识等)及外在因素(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背景等)的双重影响,而政治理论通过影响政治制度可以有效影响政治实践。当代政治理论为了摆脱长期兴盛发展之后陷入的对政治实践缺乏影响的困境,有必要抛弃内含的静态的整体社会观以及内在原则决定政治制度这一简单假定,而引入对动态政治实践的关注,将政治制度视为影响政治实践的诸独立可变因素之一。

关键词: 麦迪逊;当代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实践

作者简介: 张国栋,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与当代政治理论。

收稿日期: 2012-10-09

中图分类号: D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2013)01-0085-06

20世纪后半叶,当代政治哲学在美国大学中兴起,并成为当代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这场运动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这些成果很少对现实政治产生重要影响。长期的兴盛发展之后,当代政治哲学仅仅局限于学院之内,对现实政治缺乏影响这一困境变得日益明显,许多当代政治理论家对此都深有体会。《牛津政治理论手册》这一经典著作,以谈论当代政治理论的无用性开篇^{[1]3}。此外,桑德尔承认,“政治哲学往往看上去与这个世界相隔遥远”^{[2]1}。佩迪特相信,“对哲学家们而言,认识到他们所能取得之成就的局限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只能期望自己的声音为一个极小的圈子所倾听,并且即使他们赢得了其他的受众,多半也仅仅是因为他人恰好正在说相关的事情:它们只是对话之洪流的一部分”^{[3]4}。钱永祥看到,在今天政治哲学仍然被怀疑“是否有其可能”,“毕竟,我们这个时代和文明,在虚无与纵欲之间振荡跌撞已经有了一段时间,连‘政治理性’这个本身都已经显得腴腆生涩了”^{[4]12-13}。刘训练批评共和主义这一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主流思潮,认为它必须进行彻底的理论重构,“否则,它难免要沦为一种政治乡愁或乌托邦”^{[5]63}。

当代政治理论是否可能摆脱这种对现实缺乏影响的困境,对政治实践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笔者将通过研究麦迪逊政治理论这一重要案

例,发展一个模型来阐释“政治理论何以影响政治实践”,进而回答前述重要问题。

一、麦迪逊的政治理论: 一种以制度为中心的理论

对麦迪逊的政治理论,主要有进步主义、多元主义和共和主义这三种不同的解释。这三种解释都有需要吸收的可取之处,但也都存在严重的不足。为了充分把握麦迪逊政治理论的性质,有必要转向一种以制度为中心的视角。

1. 对麦迪逊政治理论的进步主义解释

比尔德是进步主义解释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政治实践受追逐经济利益这一内在动机的支配。美国的政治制度是这一实践的产物,旨在保证有资产者的利益不受广大人民的侵害,而麦迪逊的政治理论是其经济动机的直接反映。他推崇《联邦党人文集》,认为其解释“在现有的对于政治的经济解释中,可说是最优秀的见解”。他认为,“他们的呼吁主要是就物质的和实在的利益方面而发的”,麦迪逊和汉密尔顿都明白,与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相比较,其他问题都不过是枝节问题^{[6]108}。比尔德指出,分析麦迪逊所著第十篇,可以看到,“一切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经济任务”^{[6]110}。比尔德得出结论,麦迪逊等人的“主要思想就是要从根基上,也

就是在政府各部门的政治权力的来源上,分散侵犯的力量”。“此外,他们还赋予司法以特殊的地位,借以抗衡麦迪逊所谓的‘利益一致的压倒的多数’,同时运用法律的庄严与神秘,借以防御对民主的侵犯”^{[6]113}。

比尔德的结论是基于对历史资料的分析得出来的。后来的学者们对资料做了更大范围的研究,发现比尔德的结论无法成立^[7]。结论无法成立之外,比尔德的政治动机也得到了揭示。扎克特认为,“比尔德对建国的看法,显然服务于20世纪早期进步主义运动的政治议程”^{[8]98}。在今天,没有严肃的学者会认为比尔德对美国宪法的解释和对麦迪逊的解释是正确的^{[9]12}。

2. 对麦迪逊政治理论的多元主义解释

进步主义解释的不足导致了多元主义解释的产生。达尔首先发展了麦迪逊理论的多元主义解释,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与比尔德一样认为,人们的政治实践主要受追求自身利益这一动机的支配。但是他并不认为麦迪逊的政治理论是其经济动机的反映,也不认为美国政治制度是有资产者这种政治实践的直接产物。达尔认为,美国政治制度是一种多头统治的政体,在其中人们结成数量众多的利益集团,争取使得自己的利益在政府决策中被给予足够的考虑。麦迪逊作为这种政治制度的主要设计者,并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保证所有人民的利益。他定义多头政体为“一套在大范围内实行民主不可或缺的政治制度”^{[10]301}。它不民主的特征首先并非来自居心叵测的利益集团,而是来自人力无法改变的历史和环境。麦迪逊发展其政治理论,并非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在众多较小利益集团互相竞争的社会背景下实现民主。达尔所提出的这种理论以多元主义知名,而麦迪逊则由此被认为是“美国政治科学中的多元主义之父”^{[11]236}。

马丁·戴尔蒙德发展了达尔的解释,认为存在关于好和坏的确切知识,麦迪逊的政治实践是由这种确切的知识而不是由利益或激情所驱动的^{[12]56}。他还认为,麦迪逊设计美国政治制度的首要目的,既不像比尔德所认为的那样是保障权势集团的财产权,也不像达尔所认为的那样,要在多数人要求的平等权利和少数人要求的保护不平等的财产之间进行妥协,而是

要通过弥补民主政体的弊病来建立一个更好的民主政体。也就是说,他认为麦迪逊等人的首要着眼点,并不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而是政治的。戴尔蒙德认为,与比尔德和达尔认为的相反,经济问题并不是麦迪逊思考和行动的起点,而是他思考的终点。麦迪逊在逻辑上为了解决一个民主政体的弊端这个政治问题,而选择了商业大共和国这个社会和经济方案^[12]。

3. 对麦迪逊政治理论的共和主义解释

共和主义者批评多元主义理论。森斯坦批评多元主义政治理论的目标是保证各种输入准确地反映在立法中;制度因此就是用来集合公民偏好的一种手段。这种制度对不良偏好和不平等权力放任自流,把法律看成是交易而非论证的产物,不重视政治参与,而且偏好的精确集合由于循环等问题是不可能完成的,“总的来说,它们表明多元主义是一种完全没有吸引力的政治观念”^{[13]279-281}。因此,共和主义作为一种对多元主义的替代方案被提了出来^{[13]282-296}。

共和主义者认为,政治实践应该受德性而非利益的支配,政治理论的核心应该是德性而非利益,美国政治制度也不仅旨在保障利益也旨在促进德性。桑德尔解释麦迪逊等人的理论“首先,他们仍然相信有德者应该统治,而且政府应该以超越私人利益总和之上的共同善为目标。第二,他们没有放弃共和政治塑造公民的志向,没有放弃培育特定类型的公民与政府利害相关这一概念”^{[2]153-154}。桑德尔更仔细地分析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发现有德性者统治“这一目标把麦迪逊与现今借用他名字的利益团体多元主义区别开来。在麦迪逊看来,允许利益团体进入体制的理由并不是要让利益团体来统治,而是要解除利益团体的力量,让利益团体当成平手,这样无私的政治家才可能不受利益团体的妨碍地实行统治。凭借建立幅员广阔的共和国,容纳‘多种党派和利益’的理由不是为了更接近人民的一致,而是为了增大这些不同的利益相互抵消的可能性,这就让明智的政治家能够摆脱这些利益”^{[2]154}。

回顾以上三种解释,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人的政治实践受内在因素的影响。比尔德和达尔相信人的政治行动主要受追逐经济利益这种内在驱动所支配。戴尔蒙德强调人的行动受知识的影响。共和主义者们强调

德性对人的政治行动的影响。他们的洞见都有道理,但均不够全面。我们看到,人的政治行动无可否认地受到利益、知识和德性这三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是在这些内在因素之外,还有外在因素影响人的政治行动。当代新制度主义理论已经指出,制度会影响人的政治实践^[14]。而且正如鲍·罗斯坦在《政治科学新手册》中所说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是古典政治理论的中心内容”^{[15]205}。古典政治理论的中心,是政治制度,而非利益、知识或德性。这三种对麦迪逊理论的主要解释,都错置了中心。

事实上,麦迪逊的政治理论,首先关注的也是旧政治制度的改善和新政治制度的建立。麦迪逊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被认为是美国建国者之一,与其他人一起建立了美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麦迪逊将他的任务视为对邦联的完善,他为此而研究了古代的共和国的兴衰利弊和美国当时邦联的利弊,并采取行动改善或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正如众所周知但却常常被忽视的,麦迪逊写作《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其首要目的,如果不是惟一目的的话,也是希望能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而不是为了利益、知识或德性。可以说,麦迪逊关注的首先是政治制度,他的政治理论采取的是以政治制度为中心视角,试图通过政治制度来影响人们的政治实践。

二、麦迪逊政治理论对政治实践的影响

麦迪逊政治理论对政治实践的影响在历史上是十分不均衡的,经历了受忽略、受批评和受重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分析这种不均衡的影响,将使得我们看到政治理论发挥影响所必须的条件。

1. 麦迪逊政治理论之埋没

麦迪逊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是《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虽然它的理论成就和政治重要性在今天看来十分明显,但是在19世纪却完全不受重视。道格拉斯·阿代尔的考证表明,在19世纪,不仅《联邦党人文集》的编者忽视第十篇,而且研究美国宪法形成的历史学家对它也略过不提,甚至麦迪逊的传记作者对它也毫不重视^{[16]50-52}。

阿代尔指出,表达麦迪逊政治理论的这一

重要文本受到忽视,在两个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原因。第一个阶段是内战结束之前。在这个阶段,第十篇受忽视是由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当时人们的政治注意力集中在南部各州与联邦之间的紧张这一日益恶化的问题上,而州权与联邦权力的关系并不是第十篇的重点。第二个阶段是内战结束到进步主义运动兴起之前。内战结束之后,随着工业化进程兴起了一个新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对之前主导性的对宪法的农业主义解释非常不满,他们赞扬支持工业的汉密尔顿,发展了一种新汉密尔顿主义的宪政哲学,同时极力贬低被认为支持农业主义的麦迪逊和杰斐逊^{[16]52-54}。

2. 麦迪逊政治理论之复兴

在19世纪的长期忽视之后,这篇文章的经典地位是在20世纪中期逐渐确立起来的,并且是作为批评的靶子被树立起来的。正如它被忽视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它备受重视同样如此。在确立这篇论文的经典地位方面,没有谁比比尔德的影响更大。比尔德影响深远的著作《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不仅使麦迪逊这篇论文在宪法解释中取得了特殊重要的地位,而且给这篇论文的解释投下了长久不散的阴影^{[17]175}。比尔德对麦迪逊这篇论文的选择性的解释,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而非学术上的兴趣。当时比尔德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个活跃成员,而进步主义是对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一种反应^[18]。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政治和理论的进步,比尔德将美国宪法视为阻碍进步主义运动的重要绊脚石,解释麦迪逊的这篇论文是为了揭露宪法偏袒富人的阶级本质,以此诋毁那部宪法的合法性,从而为接下来政治经济改革铺平道路^{[16]48}。

3. 麦迪逊政治理论影响之扩大

在20世纪中期之后,麦迪逊的政治理论才被确立为值得赞扬的正面经典。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种对麦迪逊的重要解释,也就是多元主义的解释兴起了。罗伯特·达尔在《民主理论的前言》这部多元主义的奠基著作中,通过对麦迪逊这篇论文的解释发展了他的多元主义解释^[19]。而马丁·戴尔蒙德进一步将麦迪逊解释为一个多元主义者^[12]。如果说比尔德的解释有进步色彩的话,这种多元主义的解释可以说是保守色彩。多元主义理论被认为

是对平民主义的否定,而戴尔蒙德更是明确地试图以麦迪逊的理论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多元主义者的意图可以说是针对批评为美国的政治制度辩护。多元主义的解释之后,第三种解释,也就是共和主义的解释兴起。如迈克尔·扎克特所总结的,主导着近期这些研究的主题与当代政治生活是平行的^[8]。也正如桑德尔明确承认的,复兴当代共和主义的愿望是出于对当代政治生活的不满^[2]。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麦迪逊的政治理论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十分复杂而且不均衡的,人们是否接受和认可麦迪逊的政治理论,受到他们所处的政治、社会、经济情势以及自身意图的影响。当社会的冲突(例如美国的奴隶制问题)不能在宪法的框架下解决,而最终只能诉诸武力的时候(即美国内战),麦迪逊的政治理论就被忽视了。而在美国的进步主义时期,当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政治制度提出新的要求的时候,人们将现有的政治制度看做一种需要改造的障碍,因而对宪法及其背后的麦迪逊理论进行猛烈批评。在20世纪中期,美国的政治制度基本稳固并且和社会经济状况互相适应的时候,人们将麦迪逊的政治理论发展为多元主义来为这种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辩护。在20世纪后期,当人们提出更高要求,希望过更美好生活的时候,又发掘麦迪逊政治理论中关注德性的共和主义一面。

因此,政治理论是否可以发挥重要影响以及发挥何种性质的影响,受限于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社会经济背景是研究政治理论的影响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三、政治理论影响政治实践的模型

我们已经看到政治理论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发挥影响的。在这种背景下,政治行动者转向麦迪逊的政治理论,而非直接表达自己的偏好,要求自己的偏好得到满足,是由于政治制度的中介作用。当代政治科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并不完全是内生的,而是受到了政治制度的塑造^[20]¹⁵²。美国宪法是美国最重要的正式政治制度,它界定了合法和非法的偏好,使得合法的偏好可以顺利表达并因而得以加强,并且使得非法的偏好无

法变成行动并因此受到抑制。例如,在美国建国的早期,人们偏好美国政府在国内交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这种偏好在国会中形成了多数,但是麦迪逊作为总统,根据宪法判定这种偏好是不合法的,因而禁止了这种偏好的实现^[21]。因此,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偏好,必须转向政治制度,说明根据正式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宪法,这些偏好应该实现。而如果这些偏好不被政治制度尤其是宪法所允许,那么人们就必须去论证自己的偏好是正当的,阻碍这种偏好实现的现存政治制度是不正当的,并因此应该被改变。

一种政治制度总是出于特定理由才被建立起来的。美国建国者们根据一些理由建立了美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并且根据这些理由相信他们所建立的这种政治制度是正当的。这些理由,由麦迪逊做出了最好的表达。因此,人们如果要证明自己的偏好在现存制度下是正当而应该实现的,那么就可能会诉诸麦迪逊所表达的理由;如果人们要证明自己的偏好是正当而应该实现的,而禁止这些偏好的现存制度是不正当的,那么他们也需要去证明麦迪逊所给出的证明这个制度为正当的理论是错误的。总之,人们不是直接表达自己的偏好,而是转向对麦迪逊理论的批评、解释和赞美,是由于麦迪逊提出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宪法所建立于其上的政治理论(当人们的偏好太过于强烈地不一致,以至于最终只能诉诸武力来解决冲突的时候,人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正式的政治制度,这也是麦迪逊的政治理论在19世纪备受忽视的主要原因)。因此,比尔德等进步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去批评和贬低宪法,并且力图证明麦迪逊支持这种宪法的理论是不正当的。而达尔和戴尔蒙德等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情势大体上相互适应的多元主义者,则去解释麦迪逊的政治理论,并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桑德尔等共和主义者,则援引麦迪逊的政治理论,来证明自己的共和主义偏好是正当的。

总结以上,可以看到,麦迪逊政治理论对政治实践的影响,是通过美国政治制度这一中介进行的。

本文考察政治理论对政治实践的影响,为此而分析了影响政治实践的可能因素。如图1

所示,人的政治行动受到人的政治意图的支配:人们之所以采取某种政治行动,通常是由于他们想要采取这种政治行动。而人的政治意图受到内部因素(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德性和知识)与外部因素(政治制度、社会经济背景)的双重影响。麦迪逊的政治理论,是通过政治制度这一中介和其他因素一起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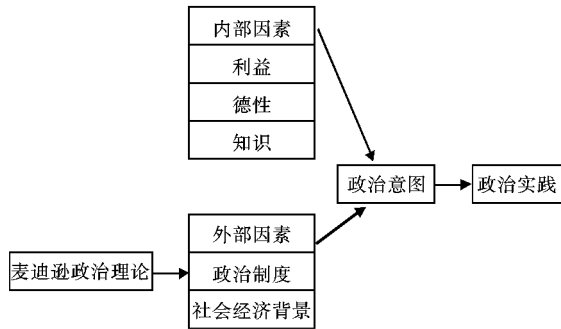


图 1 影响政治实践的因素

四、麦迪逊对当代政治理论的启示

麦迪逊的政治理论通过塑造政治制度而深深影响着政治实践,而当代政治理论同样将政治制度放置于视野的中心。约翰·罗尔斯被认为复兴了当代英美政治哲学^{[22]45},他的《正义论》被认为是当代政治理论最为核心的文本,设置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方向和议程。在《正义论》接近开头的部分,他讨论了自己关心的主题“我们现在的题目是社会的正义。对我们来说,正义在此的首要主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the basic structure),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划分的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宪法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23]6}罗尔斯的基本思路是,可以确定内在于人的两个正义原则,在无知之幕后人们会根据这些原则来选择政治制度,而这种制度就是正义的政治制度。如图 2 所示,这样一种政治理论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个人的内部因素来确定外部的政治制度,而忽略了图 1 中的政治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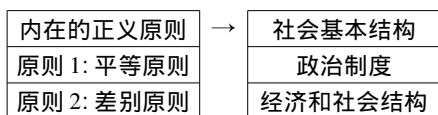


图 2 罗尔斯政治理论的结构

这种忽略政治实践的理论是一种静态的政治理论,而这种静态政治理论背后又是一种整体的社会观。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所以才有“社会基本结构”。而在这样一个整体中,个人内在的原则又具有核心地位,可以决定社会基本结构。这种观点明显受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罗尔斯写作《正义论》时流行的结构主义社会学的影响。晚近的社会学已经扬弃了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迈克尔·曼指出,“社会不是单一的。它们不是(封闭的或开放的)社会系统;它们不是整体”^{[24]1}。因为不存在静态的社会整体,所以也不存在静态的社会基本结构,以及可以决定这种静态结构的静态原则。正如迈克尔·曼所说,“人类造就的不是单一社会,而是多样的社会互动的交叉网络”^{[24]21}。意识形态、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因素存在复杂的互动,没有哪一个因素可以“决定”其他因素的“基本结构”。

必须将罗尔斯所忽视的政治实践带回考虑的中心,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由某个单一因素决定的静态社会。将视角从静态的社会基本结构及其决定原则换到动态的政治实践,会导致政治制度地位的变化。政治制度不再会被看成是由基本原则决定的,而会被看成是影响政治实践的诸多因素之一。正如前文所述,人的政治实践受到内在因素(追逐利益的冲动、德性和知识)以及外部因素(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双重影响。因此,当代政治理论家可以像麦迪逊那样,通过影响政治制度而影响政治实践,从而摆脱对政治实践缺乏影响的困境,并且这种理论必须将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纳入考虑,而不能单只考虑内心原则的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 [1] John Dryzek, Bonnie Honig and Anne Phillips. “Introductio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 (美) 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曾纪茂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 [3] (澳) 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4] 钱永祥《为政治寻找理性》,载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 [5] 刘训练《共和主义的复兴——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局限与困境》,载《国外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 期。
- [6] (美) 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
- [7] 弗瑞斯特麦·克唐纳《查尔斯奥·斯汀·比尔德小传》,张超译,载《共和对话录》,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8 年版。
- [8] Michael P. Zuckert. “The Federalist’ at 200 – What’s It to Us”,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1990(1) .
- [9] Lance Banning. “The Hamiltonian Madison: A Reconsideration”, *The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Vol. 92, 1984(1) .
- [10] (美) 罗伯特·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佟德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 [11] John Zvesper. “The Madisonian System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84 (2) .
- [12] Martin Diamond. “Democracy and the Federalist: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Framers’ Int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9(1) .
- [13] (美) 凯斯·森斯坦《超越共和主义复兴》,应奇译,载应奇,刘训练等编,《公民共和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6 年版。
- [14] (美) 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载《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 [15] (美) 鲍·罗斯坦《政治制度:综述》,载古丁、克林斯曼等编《政治科学新手册》,北京: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 [16] Douglass G Adair. “The Tenth Federalist Revisited”,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1951(1) .
- [17] Gordon S. Woo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 [18]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 [19] (美) 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 [20] (美) 凯瑟琳·西伦·斯温·斯坦默《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载《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 [21] 叶凡美《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对〈红利法案〉的否决》,载《史学月刊》2008 年第 7 期。
- [22] Richard J. Arneson. “Justice After Rawl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3] (美)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 [24] (美)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 1 卷)》,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How Do Political Theories Influence Political Practice

——An Analysis Focusing on James Madison’s Political Theory

ZHANG Guo-d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James Madison’s political theory has a complex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practice. An analysis on this influence will reveal that the political practice will be influenced both by internal factors (the desire to pursue interests, virtue and knowledge, etc.) and external factor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etc.), and political theory can effectively influence political practice through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fter a long flourishing perio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had found itself had a little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ractice.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is predicament, it has to abandon the static and holistic view of society as well as the viewpoint that the inherent principle could solely determine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ynamic political practice and regard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s one of the various independent variables which have an impact on political practice.

Key words: James Madis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institution; political practice

责任编辑 胡章成